

## 历史的重读：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启示

徐弃郁

**内容提要：**当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为使其尽可能客观，应重新回顾一战起源与责任问题，这是所有反思的原点问题。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历史与现实的类比仍需十分谨慎，至少需要同时关注历史相似性和差异性，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启示只能是尝试性的，其中包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安全困境问题和联盟体系问题的相关思考。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 历史类比 崛起大国 守成大国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后人对其反思和争论也从未间断。然而，在这场战争爆发100周年之际，人们的关注似乎更多地集中在其狭义内涵上，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竞争和相应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这种现实关怀和历史解读的相互交织，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原本就争议不断的话题变得更加复杂，由此而得出的启示与思考似乎也需要更加谨慎。

### 一、关于一战起源与德国责任

很多关于一战百年的文章多多少少都涉及了一战起源的问题，而这又是现实关系和历史解读相交叉最密集之处，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容易触动敏感的话题。因此，在讨论对一战的启示和反思之前，有必要先细究一下这个基础性的问题。

---

徐弃郁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如果从大国竞争，特别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竞争的角度来审视一战，那么一战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就与英德矛盾相关，尤其是德国的战争责任问题。在中国，长期以来对一战的起源问题承袭了列宁的判断，即一战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引发的。在这一宏观判断之下，列宁实际上也明确了战争的主要责任方。比如在“俄国的休特古姆派”一文中，列宁就指出：“两个强盗不等三个强盗拿到他们订购的新刀子就发动了进攻，这值得大惊小怪吗？”<sup>1</sup>从而指明了德国和奥匈是主动挑起战争的一方。对于当时面临艰巨反帝反殖任务的中国来说，这一解释的深度足够，又契合自身的需要，因而一直没有太多争议。

而在西方世界，特别是欧洲国家，对该问题的解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事关重大，涉及刻骨的记忆和重要现实利益。如果将德国责任和一战起源问题的研究梳理一下，总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战争责任问题直接与赔款等一系列对战败国的处置有关，现实政治的考虑占了绝对上风，因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并未开始，只是由英法等战胜国作出结论，并写入《凡尔赛条约》。《凡尔赛条约》第231条关于“战争罪”的款项明确指出，德国是出于侵略他国的目的，蓄意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必须对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与损害”承担责任。<sup>2</sup>实际上，列宁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划为这一派观点。

第二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在这一时期，一战的各交战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外交档案，以“澄清”事实。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托洛茨基马上就公布了沙俄政府的部分外交档案，以揭露帝国主义是为了瓜分世界而进行战争的。1918年德国革命后，德国新政府授权卡尔·考茨基整理有关战争起源的德国外交文件，并于1922—1927年陆续出版了39卷的外交档案汇编。1926—1938年，英国政府出版了11卷《1898—1914年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1930年，法国有关一战爆发的外交文档也开始出版。这些文件为研究一战起源和战前德国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使这方面的研究开始起步。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威尔逊“十四点”精神的影响，重点放在战前的结盟体系和单纯由内阁秘密进行的“旧式外交”上。实际多数人已经否定了德国蓄意侵略、为称霸世界蓄意发动战争的观点，认为各主要交战国对大战的爆发均有责任，问题只是哪个大国应负的责任更多一些。<sup>3</sup>即使是参与《凡尔赛条约》谈判和签署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在1914年时没

1 列宁：《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列宁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1页。

2 《国际条约集1917—192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58页。

3 除认为德国应负主要责任的观点外，美国学者西德尼·布·费伊(Sidney B. Fay)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就将主要责任归于奥匈，而德国学者普遍认为德国是在外界的对敌压力下被迫应战，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大战的最终爆发是因为德国中了英国的圈套，因而英国和俄国应负主要责任。参见 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Ltd, 1984, p.4.

有哪个国家想要战争，一战的爆发主要源于列强的战争边缘政策最后失控。<sup>1</sup> 二战以后，研究重点转向一战起源和二战起源之间的联系，在德国问题的研究上也是如此，比如凡尔赛条约，特别是其中战争罪行的条款与魏玛共和国倒台和希特勒的上台之间的因果关系，威廉二世与希特勒的对外政策之间的渊源，等等。而在德国走向一战的原因上，虽然已经有不少声音开始强调纳粹和德国军国主义传统之间的传承和必然，但主流观点仍然认为一战起源复杂，坚持德国为称霸目的蓄意发动一场大战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市场。1951年10月德法两国历史学家的一项共同声明写道：“这些文献不允许人们将1914年有意发动一场欧洲战争的责任推诿给任何一国政府或任何一个民族……德国1914年的政策并非旨在发动一场欧洲战争，它主要是受对奥匈帝国的同盟义务所制约。”<sup>2</sup> 应该说，这是当时主流研究状况的一种反映。

第三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这一时期也是“费舍尔革命”的兴起和全盛时期。20世纪60年代，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的两部书——《攫取世界霸权》和《幻觉战争》——先后出版，他在书中运用了大量史料特别是一些新近公开的史料，指出德国有意挑起一战以实现其并吞土地的野心，并认为德国的社会压力使德国统治精英有更大的动机发动战争以转移国内视线。<sup>3</sup> 这种观点在有关德国的战争责任和一战起源研究中掀起了一场“费舍尔革命”，在德国国内遭到保守派学者，如利特尔(Gerhard Ritter)、赫尔茨勒(Erwin Hölzle)等人的激烈反驳。<sup>4</sup> 但此后不久，费舍尔周围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派，其主要观点也逐渐演化为另一种正统。<sup>5</sup> 首先，费舍尔注重社会结构和压力的研究方式受到大西洋彼岸部分美国学者的呼应，因为他们也试图通过社会结构、压力集团等研究来解释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其次，他的观点符合了部分人的需要，因而广受

1 Davi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Vol.1, London: Odhams Press Ltd, 1938, p.32.

2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里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高年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页。

3 Fritz Fisch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918*,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61 (该书中译本名为《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Krieg der Illusionen: 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11-1914*,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69.

4 比如，对于费舍尔以战争目标作为德国有意发动战争的依据，赫尔茨勒就认为战争爆发以后提出的计划很难被认为是开战的目的，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参战国就会考虑胜利后的条件，比如法国希望拿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并且吞并德国的煤铁产区、俄国希望获得君士坦丁堡等，所以国家为之走向战争的目的和一旦开战且胜利有望时提出的设想应有所区别，Erwin Hölzle, *Die Selbstentmachtung Europas: Das Experiment des Friedens vor und im Ersten Weltkrieg*, Frankfurt: Musterschmidt Göttingen, 1975 (《欧洲的自我去势：一战前和一战中的和平尝试》，1975年版)，pp.38-41.

5 其代表人物除费舍尔本人外，还有著名历史学家伊曼努尔·盖斯(Immanuel Geiss)，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等。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多数费舍尔的批评者已经接受了他关于德国有意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说法，参见John. A. Mose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The Fischer Controversy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75.

欢迎。德国国内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反对者、自由民主派、德国侵略的受害者、和平主义者，以及担心德国重新崛起的外国政治家等人都很容易接受这样的历史解释。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学术观点与当时的政治需要也不谋而合。对纳粹罪行的憎恶促使人们从德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传统渊源上来进行批判和反思，希望从根子上避免德国重蹈覆辙。1947年解散普鲁士邦就是一个例子。把德国说成“一贯”试图侵略，或是强调德国在一战前的政策和纳粹时期征服政策之间的延续性，从谴责德国军国主义传统的效果来说自然是很好的。可以说，像“费舍尔派”的结论那样有助于批判德国的政治传统、形成德国走和平道路的舆论监督的事例，在学术研究中也是鲜有其例。但是，学术成绩与政治效果毕竟不能画等号。随着时间的流逝，“费舍尔派”在研究中很多牵强、臆断的说法也越来越明显，受到部分学者强有力的质疑。

第四阶段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对“费舍尔派”观点的修正或批驳。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乔尔（James Joll）就认为，德国在1914年并非想发起一场大战，而只是希望利用一些机会、占一些便宜而已，德国在战争爆发以后才制定的征服计划无法证明德国是为了这些目标而开战。<sup>1</sup>不少与“费舍尔派”观点相左的历史学家则强调正确、理性地看待一些新的史料。<sup>2</sup>研究一战史的第四代，如斯蒂文森（David Stevenson）则提出，德国的参战来自于它“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因而在危机中奉行了一种高度冒险的政策，使危机最后失控。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主流观点基本可以看成是对“费舍尔革命”的反动，总体以德国应对政策失当、危机处理失当来解释德国走向战争的原因，认为德国进行了一场违背它初衷的全面战争，其动机并不是预先就蓄意以武力来实现领土和经济扩张目的，而是出于作为大国自我保全的防御性意图。<sup>3</sup>简言之，一战既非德国蓄意挑起，也非完全意外发生的战争，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

1 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Ltd.1984, p.144, 应该说他的观点也经历了一定的转变，参见 James Joll, "The 1914 Debate Continues," *Past and Present*, No.34, July 1966, pp.100-113; P. H. S. Hatton, "Britain and Germany in 1914: The July Crisis and War Aims," *Past and Present*, No. 36, April 1967, pp.138-143.

2 1972年，德国一战前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最亲近的顾问库特·里茨勒（Kurt Riezler）的日记出版，成为“费舍尔派”及其反对者竞相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他的日记只是再一次印证了德国在1914年准备采取一种危险的、高度冒险的政策，但并没有解释这种政策是一种长期酝酿的、蓄意侵略的行为，还是仅仅是出于防御的动机。“费舍尔派”虽然从自己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但总体上看里茨勒的日记在更大程度上有利于“费舍尔派”的反对者。

3 参见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Explaining World War 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David Stevenson, *Armaments and the Coming of War: Europe, 1904-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 二、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类比

在这一基础上，可以看一下历史与现实的类比问题。

实际上，至少从2011年基辛格的《论中国》起，将百年前的历史与当前国际政治现状，特别是中国崛起进行的类比就已经开始。基辛格在书的结束语部分专门以“《克劳备忘录》：历史会重演吗？”为标题，将中美关系与百年前的崛起—霸权关系——英德关系进行对照。然而，基辛格的历史类比总体上说是比较谨慎的，一方面警告人们应重视历史上的教训，另一方面也尽力避免因简单类似而产生的误导。<sup>1</sup> 到2013年底，随着一战百年的纪念活动全面展开，一些纪念文章的指向性进一步加强，与现实的类比也更加直接。比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一战纪念文章就直接将当今的大国和一战前的格局进行“对号入座”：美国像当年的英国，中国像当年的德国，日本像当年的法国。尽管文章紧接着又谈到这种类比不精确的一面，但其所希望强调的主旨还是非常突出。<sup>2</sup> 加拿大学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其新著《结束和平的战争》中，明确地将今天的中美关系与百年前的英德关系相提并论。她在为布鲁金斯学会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同样突出强调了这种历史的类比。<sup>3</sup> 这些强调历史相似性的观点往往暗含着一个现实结论，那就是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而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一些政要也加入这一强调历史相似性的阵营，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另辟蹊径地将中日关系与1914年前的英德关系相提并论，令人哑然。<sup>4</sup>

也许正是这种现实性结论，而不是对历史看法的本身，促使另一些学者就一战发表看法。比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2014年1月发表了“1914重现？”一文，除了像基辛格那样强调需谨慎对待历史类比外，他还强调了当今世界与1914年的差异以及中美关系与英德关系的重大不同。简言之，就是通过突

1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p.514-530.

2 "Look Back with Angst",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1, 2013-January 3, 2014, p.13.

3 Margaret MacMillan, "The Rhyme of History: Lessons of the Great War,"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essays/2013/rhyme-of-history?utm\\_campaign=brookings-essay&utm\\_source=hs\\_email&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11424496&hsenc=p2ANqtz--OFJg\\_LkWuXK1t866D69z0gcYi4uR067toJdtusKzxrqJQYfC9Kid83AW4\\_R0wstouduhxQvY6v19XZEHeDYmD6Qc9ZQ&hsmi=11424496#ch8](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essays/2013/rhyme-of-history?utm_campaign=brookings-essay&utm_source=hs_email&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11424496&hsenc=p2ANqtz--OFJg_LkWuXK1t866D69z0gcYi4uR067toJdtusKzxrqJQYfC9Kid83AW4_R0wstouduhxQvY6v19XZEHeDYmD6Qc9ZQ&hsmi=11424496#ch8), 2014-2-10.

4 《安倍晋三称中日关系像一战前英德关系》，新浪网，2014年1月23日，<http://news.sina.com.cn/wd/2014-01-23/080129324382.shtml>，2014年2月1日登录。

出差异性来冲淡历史的相似性，并得出中美不一定冲突的结论。<sup>1</sup> 在中国香港，《南华早报》刊登的文章在强调差异性方面力度更大，其结论和文章的重点就是强调中国不是“1914年的德国”，带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反驳性的特点。<sup>2</sup>

实际上，无论是强调历史相似性还是强调差异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实，但其中的复杂性大多被忽略或简化了。

实际上，无论是强调历史相似性还是强调差异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实，但其中的复杂性大多被忽略或简化了。如前所述，人们对一战起源和德国责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至今仍存在一些争议。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一战的认识更多涉及观察者自身的哲学世界观，而不是事实本身。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历史类比就必须慎而又慎。简单地用一些差异来否认历史相似性无疑是有问题的，而简单地强调相似性同样不妥，实际两者都是一种思维上的懒

惰。如果强调相似性是为了最后导出一种“冲突不可避免”的结论，那就只能反映出其对一战前欧洲历史的无知。所以，不少历史学家，如英国一战史权威学者大卫·斯蒂文森等人的纪念文章则集中于一战本身，对任何历史类比的尝试都非常谨慎。<sup>3</sup>

如果非要进行类比的话，那么至少应同时关注历史相似性和差异性。一战前的世界是一个英国霸权正在走向衰落的世界。大英帝国虽然在海军、金融和国际贸易等重要领域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并掌握着世界的“制度性霸权”，但作为财富和权力基础的工业生产却在国际竞争中不断下滑。在1870年，英国占世界工业产出的32%，而到1910年，英国只占14.7% 德国占15.9%，美国占35.3%。<sup>4</sup> 这一比例也说明，如果一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崛起大国和霸权国的战略竞争，那么这也是一场“错位”竞争，即英国坚决遏制的并不是最强劲的对手，而是一个相对较弱、也相对有把握战胜的对手。对英国来说，1812年的美英战争已经证明，即使是一场胜利的战争也不可能遏制美国崛起，更何况在20世纪初英国对羽翼日丰的美国作战已经没有胜算。英国海军大臣赛尔邦当时就在私信中坦言：“如果有可能避免的话，我将永远不会与美国争吵。我们的国民还没完全了解这一点，美国的财力是足够的，如果他们选择扩建海军的话，他们将建起一支和我

1 Joseph. S. Nye, "1914 Revisited?"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joseph-s-nye-asks-whether-war-between-china-and-the-us-is-as-inevitable-as-many-believe-world-war-i-to-have-been>, 2014-2-6.

2 《南华早报》网站1月20日刊登题为《在中国的崛起中听不到1914年的回响》的署名文章，作者保罗·莱特斯，对该文的内容介绍参见“南华早报：中国不是‘1914年的德国’”，《参考消息》网站，<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122/338212.shtml>，2014年2月12日登录。

3 David Stevenson, "Learning From the Past: The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January 2014, <http://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s/ia/archive/view/196606>, 2014-3-2.

4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0, p.291.

们一样大的舰队，然后超过我们，而且我不能肯定他们会不会这么做。”<sup>1</sup>而对于德国，英国则是坚决维持作为欧洲势力均衡的仲裁者的角色，其欧洲外交政策和海军政策都表现出不惜一战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英国还以协约的形式与法、俄组成了“非盟之盟”，从而使英德关系与欧洲大国的联盟问题交织在一起，使竞争更加难以控制。

从这一角度来看，今天的世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世界存在着一些本质性的区别。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与百年前英国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目前中国或任何一个新兴大国对美国都不可能构成像当年德国对英国那样的挑战，美国也用不着考虑与某个最强大的挑战者进行“打不赢就入伙”的联合。然而，相似性也是不可否认的，在认知领域尤其如此。美国霸权在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衰落，但心理上的焦虑却与当年的英国有相似之处。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与美国之间不会发生类似英德海军军备竞赛那种全面恶化双边关系的战略竞争，但两国在某些领域互为对手的风险却始终存在，两国力量的对比变化也会持续成为一个敏感话题。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还涉及了美国的联盟体系，特别是美日联盟，从而使问题的处理进一步复杂化。针对这种情况，主要国家进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思考确有必要，但人为地制造紧张或者宣扬某种历史宿命则显得荒谬，甚至危险。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与美国之间不会发生类似英德海军军备竞赛那种全面恶化双边关系的战略竞争，但两国在某些领域互为对手的风险却始终存在，两国力量的对比变化也会持续成为一个敏感话题。

### 三、关于一战的启示

从历史的灾难中吸取教训非常必要，但要得到正确的教训似乎很难。一战以后，人们努力从上一次大的战祸中吸取教训，但似乎都有所偏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国看到了以强硬对强硬可能加剧危机升级，但这种教训却促成了绥靖主义，反而加速了二战的爆发；二战后很多西方国家决心不让绥靖主义的错误再犯，结果对苏联的强硬反应反而加剧了冷战。在今天这样一种全球化、多极化的国际环境下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必然只能慎之又慎，所得到的启示也只是尝试性的。

首先，战争与和平始终是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大战不可避免论”往往会与“大战不可能论”互为表里，最终发展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一战前欧洲国际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也许就是对战争与和平认识的严重扭曲。一方面，欧洲国家政府似乎相信“大战不可避免”，因而纷纷扩充军

<sup>1</sup> George Monger, *The End of Isolati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00-1907*, London: Thomas Nelson & Sons Ltd, 1963, p.72.

备, 显出一幅穷兵黩武之相; 另一方面, 可能由于经历了长时期的和平, 欧洲国家对战争并没有正确的认识, 对战争的实际可能估计不足。当时有一种普遍的观点, 即各国之间的经济纽带越来越紧密, 使大规模的战争越来越不可能。就英国和德国这一主要竞争关系来看, 两国的经济联系明显高于其与各自盟国之间的联系。从1904年开始, 英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德国是英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更重要的是, 英德两国的资本形成了很好的互补, 英国大量的过剩资本正好满足了德国公司的扩张需要, 在当时40个国际制造业卡特尔中, 有22个是英德联合公司。<sup>1</sup> 英德两国的大工业家和金融家都不相信战争真的会爆发。而在政治谱系的另一端, 即左翼政党大多也持这类观点, 如19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部分理论家关注到了法德关系的明显缓和, 因此宣称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正演变到一个新阶段, 武装冲突开始变得过时。<sup>2</sup> 另外, 人们相信, 欧洲列强形成的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和工业化战争难以预料的巨大破坏力可以慑止战争爆发。就在大战爆发前4个月, 英国《泰晤士报》还刊登长文, 雄辩地论证大战之不可能: “列强被分为势力均等的两大集团……这是对超常的野心和种族仇恨突然爆发的双重制约。所有的君主、政治家和国民都知道, 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的战争将是一场无可估量的大灾难。这种认识带来的是一种责任感——就是有责任规范和约束那些最大胆、最不计后果的人。”<sup>3</sup> 而越是认为大战不可能真的爆发, 决策者和国内社会就越是敢于奢谈战争, 国家间也越是敢于走战争边缘政策, 从而又反过来为“大战不可避免”的说法提供了市场。这样, “大战不可避免论”和“大战不可能论”这两种貌似截然对立的认识, 在实际中恰恰互为表里, 其蔓延滋生的一个重要结果, 就是使各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失去了正确的判断, 对局势的控制能力也越来越弱, 其极致就是一种战略上的随波逐流和听天由命。

其次, 安全困境是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中的重大难题, 在应对这一问题上守成大国至少与后起大国肩负着相同的责任。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 安全困境指的是国家出于不安全感而追求更多权力, 结果导致他国同样增加实力以防不测, 从而形成一种紧张和敌意循环升级的过程。<sup>4</sup> 在一战前的欧洲,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大国之间, 在英德这一对守成大国和后起大国的关系中则表现得尤其突出。很多学者都认为, 这种相互疑惧和由此产生的紧张状态对一战爆发产生了重要作用。不过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中, 对这种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安全困境多数持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 或者将责任主要归

1 Zara Steiner and Keith Neilson,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Th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60-64.

2 David Stevenson,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39.

3 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Ltd, 1984, p.37.

4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2, No.2, 1950, p.157.

咎于俾斯麦下台后的德国，认为德国政策的反复无常和执意扩建海军导致了英德之间安全困境的上升。实际上，英国同样负有责任。以英德海军竞赛为例，德国对海上交通线的高度依赖是其发展大海军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掌握海上霸权的英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减少德国对海上交通线安全的担忧，相反还以此作为一种杠杆来敲打德国。比如1897年英国《星期六评论》就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反德文章，称“英国是列强中唯一不用冒大的风险且满有把握与德开战的国家……德国舰队的扩充只会使英国对它们的打击更为沉重，他们的舰只将很快沉入海底，或者被拖到英国海港”。<sup>1</sup> 在实际行动中，英国皇家海军也表现得十分霸道，先后数次扣押德国的民用船只，在德国国内引发激烈抗议。这些事件无疑为德国的大海军建设提供了刺激，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两国间的相互疑惧。1904年以后，英国孤立德国的外交行动更是激发了德国的“被包围”心态，使其政策更趋冒险，也更趋强硬。应该说，这种情况有其普遍意义。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往往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和强大的历史惯性，妥善处理的难度很大。要解决安全困境问题，仅对后起大国求全责备是远远不够的，守成大国至少也应负起相同的责任，双方努力的关键在于塑造一种相互克制的互动模式。

要解决安全困境问题，仅对后起大国求全责备是远远不够的，守成大国至少也应负起相同的责任，双方努力的关键在于塑造一种相互克制的互动模式。

最后，联盟问题往往是引发大国武力摊牌的重要诱因，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和平互动有赖于妥善处理与“第三方”、特别是联盟的关系。

一战在某种程度上由联盟体系引发。英德矛盾虽然是当时大国关系的主要矛盾，但英德关系在1912年后已经有所缓和，两国关系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海军竞赛已经决出胜负，德国事实上接受了英国关于双方无畏舰建造的比例。<sup>2</sup> 与此同时，英德两国还合作应对巴尔干战争，在旷日持久的巴格达铁路问题上也达成妥协，大战爆发前夕英国还派遣几艘主力舰访问德国港口以显示两国关系的改善。然而，一旦出现第三方因素，特别是盟国的影响，英德关系马上就出现问题。历史学家发现，两国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有着广泛的联系，当这些海外事务只涉及两国时，往往会对双边关系有积极作用，然而一旦涉及英国的盟国，这些事务就会对双边关系产生不稳定影响。<sup>3</sup> 这一点对英国来说尤为明显，保持和强化英国与法俄“非盟之盟”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德关系，换言之，为了

1 William L.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Vol.1, New York & London: Alfred A. Knopf, 1935, p.656.

2 Michael Epkenhans, *Die Wilhelmische Flottenrüstung 1908-1914: Weltmachtstreben, Industrieller Fortschritt, Soziale Integration*, Muenchen: Oldenburg Wissenschaftsverlag, 1991, p.396 (《威廉德国的海军军备1908-1914: 追求世界大国地位、工业发展与社会整合》，慕尼黑1991年版)。

3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Vol.1, *To Ar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4.

前者完全可以牺牲后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后来也承认，保持协约本身就可能成为战争的一个原因，但他认为英国值得冒这个险。<sup>1</sup>当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后，对立双方很快从奥匈和塞尔维亚扩展为奥匈与俄国，而德国由于盟国奥匈的缘故卷入战争，英国则由于俄国和法国的缘故卷入战争。因此，从冲突防范的角度来看，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焦点不一定在于两国关系本身，第三方因素，特别是盟国因素往往会起到关键作用。守成大国往往担心盟国遭受挫败会鼓励后起大国进一步挑战自己，更担心默认盟国挫败将是其整个霸权体系瓦解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政策和畅通的交流机制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根本问题也许还在于如何保持对这类因素的控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后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配合与协调，当盟国同样是一个强国时更是如此。

---

1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Vol.1, *To Ar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